

争取青年的斗争：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青团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 胡昌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北京100017)

【摘要】大革命时期,国家主义派以《醒狮》为喉舌,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扰乱革命阵线。为争取青年,任弼时主持下的中国共青团与其展开了坚决斗争:一是通过驳斥“国家至上”“全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具有欺骗性的口号,揭露了国家主义派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利用的阶级本质;二是运用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在组织上分化瓦解敌人,把受其影响的青年争取过来;三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共青团组织,牢牢巩固党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关键词】任弼时 共青团 国家主义派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5.004

1924至1927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发动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而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派,却有意或无意地充当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该派以《醒狮》周报为喉舌,在青年中散布“国家至上”“全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欺骗性口号,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扰乱革命阵线。为争取青年,中国共产党人同国家主义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主义派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大致是1925年至1926年。这一时期,共青团的工作主要由任弼时主持^①。任弼时主持下的共青团,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配合党对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为在思想上彻底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谬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任弼时和其他领导同志率领团员、青年积极投入五卅运动和大革命运动,在斗争中壮大团的组织,使青年团由一个影响极微、有浓厚学生色彩的团体,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能引导青年参加实际斗争的无产阶级战斗队,牢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任弼时后来回忆:“从一九二〇年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周刊,在中国学生知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在的青年党)作思想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在各种

收稿日期:2023-07-15

作者简介:胡昌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共党史。

^① 1925年1月团三大召开,决定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成员,任组织部主任。5月6日,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7月21日,正式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共青团四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和北伐战争中,以及在广东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1]这段话对共青团在批判国家主义派、争取青年运动的领导权中所起的作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国家主义“是我们有力量的敌人”

中国的国家主义派是从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周恩来曾指出:“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分成两派:以李大钊、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2]

1923年12月,旅法的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者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8月,随着中国青年党骨干曾琦、李璜等回国,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中心也转移到国内。国家主义派于1924年10月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并以该刊为喉舌,故又称“醒狮派”。他们标榜“国家主义是目前中国拨乱救亡之唯一良药”^[3],提出“爱国救国”“全民革命”^[4]“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5]等口号。这些口号富于欺骗性,初看起来似乎是爱国的、进步的,再加上国家主义派卖力地宣传,就使得许多革命情绪很高但对革命理论尚未彻底明了的青年误投罗网。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青年陈云就一度相信国家主义。他在后来写的一份自传中说:“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6]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国家主义派趁机加快组织发展,在各地先后成立先声社、国魂社、孤军社、中国少年自强会、独一社、悝社、国光社、复旦国家主义青年团、大夏青年团、大江会等30多个国家主义团体,并于12月成立了“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一时有“风起云涌”^[7]之势。为了“同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青少年”^[8],国家主义派还于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国家主义的风起云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高度重视。任弼时在共青团内部刊物《中学校刊》1925年3、4月合刊中指出:“现在国内国家主义盛倡一时,他们的宣传比我们更努力,故他们现在是我们有力量的敌人,各地的同志应开始作反对的宣传。”^[9]1925年10月上旬,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大会决议案指出:“国家主义者,戴季陶派以及一般智识阶级的各种落后反动的思想,反映着各种程度资产阶级的心理,一天天抬起头来了。所以目前本团团员的工作,最要是在宣传方面,须用文字图画或口头的宣传,煽动群众,使加入革命的斗争,并且需要利用各种机会,用本团名义作各种公开的宣传或活动,以坚固我们在群众中的指导地位”,“本团应在党的指导之下,与一切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奋斗,在各种行动斗争中,去批评反动思想的错误。”^[10]会后,任弼时与林育南、恽代英等先后签发多份团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九十三号、一一〇号、一一二号等),要求对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联合攻击展开反击,强调必须“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不然“为反动派所乘,使群众有离开我们之危险。”^[11]这一系列通告,为开展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指明了方向。

二、“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

为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从思想方面打倒敌人的势力,争取受他们欺骗的青年,共青团以《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配合党刊《向导》,同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1925年10月,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团中央扩大会通过《政治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中国青年》“此后应完全改为本

团真正争斗的机关报,应对各种政治问题,详加解释与批评”“应严重的攻击所有反动的思想,并积极宣传本团的主张。”^[12]任弼时、林育南等团中央领导人,都曾作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的编辑部成员,指导《中国青年》编辑工作,并撰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恽代英曾任团中央宣传部主任和《中国青年》主编。萧楚女曾协助恽代英参加团中央领导工作和编辑《中国青年》。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组织发表了一大批揭露、批判国家主义的文章,并编辑出版反国家主义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在1925年到1926年两年中,《中国青年》有42期共78篇文章或短评,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行揭露和批判;1927年上半年又发表15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或短评。只要读一读这些论战文章的标题,如《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与李瑄卿君论新国家主义》《评醒狮派》《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讨论国家主义并质曾琦》《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个好朋友——国民党右派和醒狮派》《请看国家主义者怎样外抗强权》《醒狮派——最反动势力的结晶》《“醒狮”派的马脚》《我们的功罪——斥醒狮派诸领袖》《破产的国家主义》等,我们就立刻能感受到那种犀利的战斗性。中国青年社还于1925年10月出版了萧楚女撰写的《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该书共分为二十七节,对《醒狮》周报从第一期至五十期所散布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逐一批驳,对国家主义派的反革命谬论作了系统清算。

笔战之外,还有舌战。据阳翰笙回忆:“当时国家主义派和我们争夺青年,在上海、南京一带活动很厉害,我们和他们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凶相毕露的国家主义派,我们作了大量准备。凡是曾琦、李璜、余家菊、左舜生常去活动的地方,我们也都在那里作好布置,和他们唱对台戏。他们的人一讲完,我们就立即有人接上去讲,针锋相对,逐条批驳。”^[13]还有人回忆说:“在上海,萧楚女曾应邀与曾琦对台讲演,他透彻的说理和超人的口才赢得一片掌声,相形之下,曾琦当场出丑,被听众轰下台来。国家主义分子对萧楚女又怕又恨,骂他为共产‘瘤神’。”^[14]可见,当时的论战是很激烈的。

在任弼时主持下的中国青年团,是怎样从理论上驳倒国家主义派谬论的呢?

(一)“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驳超阶级的国家观

团中央转发的党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指出:“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15]

国家主义派宣扬“国家至上”“爱国保种”,主张“个人依国家而存在,无国家即无个人,所以应当牺牲个人,尽忠于国家。”^[16]萧楚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国家观,深刻阐明了国家的阶级属性,指出“国家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只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派人不及共产党人在在有生命的危险二事看,就已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17]

国家主义派诬称五卅运动是国家主义的运动,企图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相混淆,说什么“岂有爱国而不讲国家主义者耶?”^[18]针对这种谬论,恽代英驳斥道:共产党人也爱国家,也保种族,但却绝对反对所谓国家主义,因为共产党人的爱国观点与国家主义的“爱国”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主张民族独立,全中国的解放,与他们那样主张反对阶级争斗的国家主义!如何能混为一谈呢?”^[19]恽代英还用国家主义派在五卅运动中扰乱革命群众救国行动的事实表现,揭露了他们“爱国”的虚伪。“国家主义者醒狮派,沪案发生,他们高高坐着,七嘴八舌说:‘爱国!爱国!’国是空空爱得好的?他们实际为国家,做了什么工作?”^[20]“国家主义者虽然满口爱国,但在实际上反会卖国。”^[21]

(二)树立民众在政治上的权威——驳“全民革命”

国家主义派主张不分阶级的全民革命,竭力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在国民革命的同时进行阶级斗争,认为鼓吹阶级斗争会“减杀对外之战斗力”。任弼时、恽代英等通过揭示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阐述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必要性,驳斥了这种谬论。

任弼时指出:“自‘五卅’运动以来,阶级分化作用日见明显,各地大商买办阶级,均已与帝国主义妥协,即是小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势力之膨胀,亦表示畏惧而日渐趋于消极或反动。因阶级分化所反应的阶级思想亦渐形成。他们不独不与革命势力合作而参加实际斗争,并且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行动,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22]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之所以能取得一定成功,正是“因为受了群众运动的刺激与鼓动的功效。”^[23]

恽代英更深刻地指出:“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24]他强调,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妨害而且还会助力国民革命。“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25]。

(三)“不要信那反苏联及反北伐的宣传”——揭露“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反共反苏真面目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本来是五四运动期间提出的一句口号,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一样,在当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涵。但这一口号到国家主义派手里,却被篡改了革命内涵,成为其国内反共、国际反苏的工具。他们高喊“外抗强权”,却不敢提出反帝的口号,反而把援助中国革命的苏俄(苏联)视为“强权”;他们高喊“内除国贼”,但对新旧军阀这些真正的国贼不过表面上骂几句,真正要反的却是中国共产党。任弼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者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原则,绝对反对苏俄与共产党。”^[26]

针对国家主义派鼓吹“外不亲善”、反对联合苏俄的主张,任弼时指出:“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应极力注意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联络,绝非国家主义者的清高理论所说的,只以中国民众力量就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种清高的国家主义理论,无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实质上则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会。”^[27]他在签发的团中央通告中,要求各地团组织在宣传中“务须指明压迫我们的只是各资本帝国主义国之政府”“不应立脚在反动的国家主义上面,反对一切外国及外国人”^[28],要注意宣传“中国的解放必得与世界革命相联络”,宣传“十月革命后苏俄帮助中国民族运动的事实”,揭露“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来破坏被压迫的国家和苏俄间之反帝联合战线。”^[29]

1926年11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解放运动》一文。文章驳斥“醒狮派”攻击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北伐就是助长苏联及共产党势力发展”等谬论,指出英日帝国主义援助封建军阀,目的“是想巩固自己在华的势力”“割据或瓜分中国领土”;而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及广东政府,目的“是扶助中国民众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并发展民众的革命实力,使中国达到独立与自主的成功”,两者根本目的截然不同。文章又指出:“我们应当明白战争的性质然后决定我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北伐战争是“反抗压迫取得大多数民众利益与自由的战争”,与军阀间“争权夺利割据地盘的战争”有“不同的性质”。文章最后呼吁全国被压迫民众“应当更加认清苏联是中国民众的朋友,不要信那反苏联及反北伐的宣传。”^[30]

(四)国家主义“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利用”——揭露国家主义派的阶级本质

在剖析了国家主义派的种种反动谬论后,任弼时、恽代英等对国家主义派的阶级本质作了揭露。

任弼时指出,国家主义分子是“代表残余的封建阶级思想的,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及军阀所利用”的势力,在革命过程中起反革命的作用^[31]。“那些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说北伐就是助长苏联及共产党势力发展因而反对北伐的醒狮社诸先生们的主张都是违背民众利益的。这客观上不是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利用了还是什么?”^[32]他指出,“还有一个客观上被帝国主义利用而无群众的国家主义青年组织”,“他们的领袖分子,若不从思想上根本改变其错误,则显然将流于反革命之一途,变成西欧的法西斯党。”^[33]

恽代英对国家主义的发生起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因大战受到损害,将痛苦的原因归咎于无产阶级的罢工、暴动,并且惧怕无产阶级一旦得势,必“共”他们之“产”,“于是他们集其仇恨与恐惧于无产阶级身上,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斗争的最凶猛的后备军。”^[34]

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还冲破阻力,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最先刊登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1926年2月《中国农民》给以转载。后经修改,于1926年3月在《中国青年》第116期和117期上进行了连载。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作了分析,并告诉革命青年如何分清敌友。关于国家主义派,文章分析道:“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发展必须附属于帝国主义”,“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35]“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36]这些精辟的分析,对于提高青年觉悟、明确斗争方向起了积极作用。

三、“结成革命势力的统一战线以与反动的统一战线对抗”

慑于大革命高潮中民众运动的强大力量,直、奉等不同派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结成“反赤”联盟。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也在“反赤”的口号下走向合流。为了击败国家主义派,不仅要在思想上战胜反动派的理论,以取得群众的信仰,而且要在组织上分化瓦解敌人,把受其影响的青年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共青团在与国家主义派争取青年的斗争中,十分重视运用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

一是分化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的结合。1926年1月,任弼时撰写了《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发表在团中央内部刊物《中学校刊》第2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任弼时提醒大家高度警惕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合流的危险,并号召“结成革命势力的统一战线以与反动的统一战线对抗。”他说:“在目前民族革命斗争中,我们若是不能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使国民党右派与反动的国家主义者脱离,而和我们一致对付国家主义者,形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对抗,客观上极容易促成一切反革命势力结合形成反革命统一战线而一致对付我们。因此我们须处处注意防止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分子结合,并须设法使已形成的结合能分化而破裂,力求在行动上与右派结合革命的统一战线。”^[37]此外,任弼时还在与林育南联名签发的团中央通告(第一〇九号)中指出,“应巩固左派学生的势力,拉拢中立派的学生群众,力求避免在客观上种种不必要的分裂现象,使学生组织上能统一”^[38];在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一三一号)中要求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争取国民党右派,合力对付国家主义派^[39]。

二是分化国家主义派的上层领袖和下层群众。任弼时强调,要“借统一战线策略,在行动中去揭破反动领袖的黑幕而取得其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他指出,“我们对于实际为帝国主义

及军阀所御用而无群众的国家主义者的首领,应在理论上行动上加以攻击。使一班群众(他们领导的群众在内)了解他们违反民众利益之种种反革命的勾当,而使成为众矢所集之公敌,以求消灭他们在群众中的作用。”^[40]他在和林育南联名签发的团中央通告中,要求各地团组织派“观点明确而忠实”的同志,了解国家主义等反动派的组织内容及活动,争取反动组织中的进步分子;“在有反动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的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的与对方冲突或分裂。”^[41]任弼时还签发团中央通告,要求对醒狮派应予“痛驳”,但在策略上只可攻击醒狮派中少数领袖分子及挂国家主义招牌的少数教员,“万不可谩骂迷信国家主义的学生,以致影响当地学生运动的统一。”^[42]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央在《中国青年》上公开发表《告孤军社醒狮社诸君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希望他们放开眼光,捐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的意见,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我们愿意与你们共同负起救中国的大责任,我们愿意与你们共同准备与一切压迫破坏这个民众运动的反动势力奋斗。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在实际行动中间将你们素所高叫的救国主义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43]

“国家主义青年组织里的极少数青年,本来是趋向于革命的,不过他们一时迷于反动的思想”^[44]。因此,随着在大革命进程中国家主义派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并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坚决斗争和一系列细致的工作,到1926年下半年,许多国家主义派组织纷纷瓦解。如“少年中国自强学会”“起舞社”等纷纷自行解散,并宣布“愿意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青年团体合作”。一些受国家主义欺骗和迷惑的青年逐渐觉悟过来,纷纷发表文章揭露国家主义的宗旨“并不是救国乃是卖国”,因此,再不愿做他们的殉葬品。国家主义派在青年中的影响日益缩小。国家主义派头目曾琦无奈地哀叹“赤焰熏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竞投降”^[45]。

四、在斗争中扩大组织,巩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任弼时指出:“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遇到必要的时候,流血牺牲亦为革命中不可避免的。”^[46]共青团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青年的支持,是由于共青团勇敢地走在五卅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不惜流血牺牲,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牢牢把握住党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这也是共青团能够在争取青年的斗争中打败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派的根本原因。

五卅运动期间,任弼时连续签发团中央通告,号召将反帝运动扩大到全国,指示各地团组织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还同恽代英等直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经常出席会议,听取各校汇报,部署行动。1925年6月26日,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任弼时参加大会的指导工作,恽代英担任大会党团书记,共青团员杨善南担任大会主席。杨善南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口号已显笼统,应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为口号^[47]。大会通过大会宣言、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章程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议决案》等文件,通电全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号召全国各地学生联合会及各团体罢课游行,举行示威运动,以为支援。这些文件大都是根据恽代英的意见起草,又经恽代英、任弼时修改后提交大会通过的。这次大会后,各地学生会组织空前发展。

国家主义分子原把持了一些学校校务,并在教育界和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十分不满,联合国民党右派并结合反动派教职员企图分裂全国学生运动。他们提出“肃清赤化学生运动”的口号,发表《共产党把持下之全国学生总会》等文章,散发

传单小册,宣传煽动各地学联反对全国学生总会。共青团指导全国学生总会,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散布的“赤化”“过激”等种种谬论,揭露“国家主义者污蔑学生人格图谋破坏学生运动统一”的阴谋,努力教育和争取一部分受国家主义派欺骗的青年学生,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的统一战线,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国家主义派还企图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9月,《醒狮》周报发表《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鼓吹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与其间,暗施操纵之术”。他们在上海成立“工人救国团”,开办“工余学校”,在工人中宣传国家主义^[48]。为巩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任弼时多次在团的会议里强调要学生组织工人夜校,教育青年工人。据杨之华回忆,“当时,在上海凡有青年团员的大学,几乎都附设了工人夜校,对工人进行革命宣传。”^[49]

五卅运动中,广大青年爱国热情高涨,国家主义派在标榜“爱国”的同时极力扩大组织,与我们党争夺青年群众。任弼时领导下的共青团,一方面努力揭露国家主义派假爱国实为反革命的本质,防止青年上当受骗、误投罗网,另一方面十分重视在运动中扩大组织、加强团的自身建设。1925年6月12日,任弼时签发团中央通告(第五十五号),强调“这次运动普及全国,我们应努力在此中注意吸收同学,凡是从前没有我们同学的青年群体中(如学校工厂等),我们应借这次机会,打进我们的势力,散播我们的种子。”^[50]7月21日,他又签发团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强调“盖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51]团的组织在五卅运动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由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增加了2.7倍^[52]。共青团还将3000多名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1925年10月上旬,任弼时在北京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这次扩大会向全团提出了“深入群众”的中心口号,任弼时在会后撰写的《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一文中指出:“现在是革命运动高涨,民众需要指导的时期,我们就是指导群众斗争的组织;若是不能深入群众领导他们斗争,则趋向于革命的群众,将为反动势力所领导,助长反动势力之发展,对于革命的前途不能不受一极大之打击,在革命者的本身看来,这种消极的应付,无异于是反革命的表现。”^[53]这次扩大会后,团的组织发展迅速。至1926年5月底,全国除贵州、新疆、西藏、甘肃以外,绝大多数省市都已建立团的组织。到1926年7月,经年龄分化之后,全团人数已发展到10072人^[54]。

北伐战争开始后不久,1926年7月19日至22日,任弼时在上海再次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着重提出“青年群众化”的口号。会议强调,“在此种革命潮流中,青年群众都浮动起来,若不使之加入我们的组织,受我们的领导,则大有走入反动派的组织为敌人利用的危险。因此,发展组织,以应付目前领导青年群众的需要,仍是本团组织上重要的工作。”^[55]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具体实施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决议案,为领导各方面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在斗争过程中发展组织指明了方向。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和工农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团的青年群众化,团的组织又有了巨大发展。到1927年5月共青团四大时,全国团员人数已达35000人^[56]。

从团的三大到四大,共青团已经从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57],发展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先锋队。共青团通过带领广大青年进行坚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扩大组织,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挫败了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的企图,牢牢巩固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主持下的中国共青团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其次,通过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最后,为了同国家主义派等反动派争取青年,团组织深刻认识到深入群众、领导群众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重要性,从而使团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做好当前的青年工作,切实保持和增强青年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9][27][46][51][57]《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3、10、12、14、26页。
- [2]《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 [3]方庆秋:《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 [4][5][7]李义彬:《中国青年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122、11页。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 [10][1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政治宣传工作决议案》,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2册。
- [11][38][39][41][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3、52、57、49、60页。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恽代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 [14]危石:《留得光焰照人间》,载《中国青年》,1984年第857期。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0页。
- [16]陈逸凡:《国家主义》,载《醒狮》,1924年第11号。
- [17]《萧楚女文存》,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365页。
- [18]李璜:《原来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势不两立!》,载《醒狮》,1925年第32号。
- [19][20][24][25]《恽代英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246、89、96页。
- [21][34]《恽代英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0页。
- [22][53]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2册。
- [23][43]《共青团中央告孤军社醒狮社诸君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载《中国青年》,1926年第107期。
- [26][28][29][31][37][40]蔡庆新 姚勇:《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300、329-330、260、261-262、261页。
- [30][32]任弼时:《十月革命与中国解放运动》,载《中国青年》,1926年第139期。
- [33][44][54]任弼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载《中国青年》,1926年第121期。
- [3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载《中国青年》,1926年第116期。
- [3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续),载《中国青年》,1926年第117期。
- [45][48]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72页。
- [47]翟作君 蒋志彦:《中国学生运动史》,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任弼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 [50][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9页。
- [55]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问题决议案》,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3册。
- [56]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第4册。

(责任编辑:韩永涛)